

向先行者致敬-（激荡三十年读书分享）

作者简介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书叫做《激荡三十年》，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吴晓波是商业记者出身，他采用编年史的写法，记录了1978年到2008年间中国改革及企业发展中的代表性人物与事件。此后作者又出版《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一书记录了2008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两套书可以一并阅读，从而对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企业发展脉络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本书简介

《激荡三十年》不仅是一部书，更是一段时代的记忆，一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画卷。该书以深入浅出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无数普通人的奋斗与梦想。本书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其选取的时间跨度——1978年至2008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期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将这段历史以生动而真实的笔触展现在我们面前，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深入挖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挑战和机遇。

改革的开始

1978年12月18日-22日，邓小平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正是在这次会议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从此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道路，40年来中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变革中的成功与成就

1978年，中国刚经历了文革的结束，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困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过的价值追求，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下面为大家讲讲书中提到的几个代表性事件：

-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与华西村的乡镇企业**

1978年末，中国经济改革的冲动在坚冰冻土下缓缓涌动。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发生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签下了分田到户搞包干的契约，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第二年，一向缺粮的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蔓延全国。这一年，距小岗村数百公里外的江苏省华西村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华西村是由人民公社转变而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民间公司模式。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当了48年的村党委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通过把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工作，将农民变成工人。自此，华西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华西模式成为中国乡镇经济的一面旗帜。

- **深圳特区与中关村**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境内外的经济差距过大，广东频频发边民偷渡逃港事件，特别是广东省宝安县最为严重。1979年1月31日，时任招商局董事长袁庚飞赴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袁庚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得到了准许，这块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以提高工作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基本出发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大胆推进，同步地配套进行。从打破大锅饭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在

1979到1984的几年中，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蛇口的成功经验被媒体誉为“蛇口模式”。自1980年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当时中央只给了3000万的贷款和对外开放政策，深圳各行各业都充斥着敢拼敢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靠着这批人的努力奋斗带动了深圳的繁荣。短短三年时间，到1983年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建国后30年的总和增加20倍。被称作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先生，身为国内最顶级的核聚变专家，因为“硅谷”的启发而萌生了在中国造一个“硅谷”的想法。随后他离开了中科院，在中关村创立了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在他的影响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渐成规模。

- **联想与海尔的崛起**

1984年，35岁的张瑞敏来到青岛一个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时叫做青岛日用电器厂。当时工厂产品低劣，工厂资不抵债，亏空147万。张瑞敏上任之初，定下了13条规章制度，竟然其中有一条竟然是不准在车间里随地大小便。随后张瑞敏在经营上做出重大决策，不生产洗衣机了，转而生产电冰箱。马上把厂子改名为青岛电冰箱总厂，并引进德国技术。结果生产的400多台库存冰箱全部检查后发现76台有问题。张瑞敏决定将该批冰箱全部销毁，张瑞敏砸冰箱的故事，让他一举成为传奇。1984年的北京，中关村正暗流涌动，继陈春先下海之后，一大批科学家们走出了科研机构。40岁的柳传志决定告别清闲如水的生活成立了联想，他用中科院计算机所的传达室改成了一个20平米的办公室，全公司11个人，岁数都超过了40岁。1985年，联想才找到了第一笔业务是给中科院给中科的500台IBM电脑做验收维修培训，从中赚了70万元服务费。后来柳传志说服倪光南院士加盟了联想公司，开发联想汉卡。倪光南的加盟和汉卡的问世，让联想顿时找到了主业的方向，当年就销售了300万元。后来的股市我们知道，海尔与联想都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世界500强。

- **经济的腾飞**

2002年中国加入WTO，2008年成功举办了奥运，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变革中的失败与危机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三十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注定也会遇到许多坎坷，前进的道路中必然存在各种艰难曲折，转型年代出现的社会秩序混乱与不安、权力寻租、金融资本泛滥、法制不健全等问题，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隐藏了各种社会危机。

- **法制的落后问题**

在经济改革和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私营企业的兴起和外资的进入带来了许多新的经济行为，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跟进，导致一些企业家在非正常的商业逻辑中获得了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比如1979年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这一法律在经济建设开展后成为了正常市场贸易的禁锢，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案中才被删除，显示了法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匹配。年广久，即年广久，是“傻子瓜子”品牌的创始人，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81年秋天，已经从瓜子生意中尝到甜头的年广久开始雇佣更多人，数量达到了12个人。在当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这主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全国围绕着‘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展开了激烈讨论。1989年，因经济问题被芜湖市人民检察院逮捕，两年之后，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 **因产权问题导致的国民饮料健力宝没落**

健力宝原本是广东三水县的一家本土企业，健力宝所缴的税一直是三水县地方财政的支柱，鼎盛时期占到了当地财政的80%。依靠创始人李经纬的努力，健力宝在国内饮料行业做到了国内第一，从客观事实上来说健力宝确实是李经纬独立做大的事业，没有李经纬就根本不存在健力宝，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面，健力宝是三水县的地方国有企业。这家公司在产权归属上，与李经纬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因李经纬准备将健力宝总部迁移至广州事件导致其与三水市政府关系严重恶化，后三水

市政府拒绝将健力宝出售给李经纬团队，转而直接出售给浙江国投，从此以后国民饮料健力宝逐渐走向了落寞，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

• 国企改革与下岗潮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国有企业统包统揽，企业不承担盈亏，也没有经营自主权。“缺乏生气，效率极为低下”是当时人们对国企的一致评价。由于当时的国企体制本身不适用市场体制发展，缺少灵活与激励性，在1993年到2002年，国企遭遇“最困难的十年”。1998年，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企亏损，全国国有企业所有利润相加，只有区区213.7亿元。但国企改革带来的是基层职工的下岗潮，一段事件导致原有的社会秩序崩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社会秩序混乱，特别是97年、9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当时有7000多万的失业人口，因下岗导致部分基层职工生活非常困难。同时在国企改革中由于当时法制也存在着不健全的问题，绝大部分改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存在权力寻租、腐败等问题。通过国企改革，使大量国有中小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企业数量不断减少，但经济效益屡创新高。以往国有企业“大锅饭”“铁饭碗”的局面已被打破，国有企业初步建立起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但改革总是伴随阵痛，不改革就无法前进，国企经过30年的不断变革，使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不断提升。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

感想与收获

书中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作者观点，“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这一特征带来了一个贯穿30年的景象，发生于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在它们的行为被政策认同之前，失败随时都会降临。它们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所谓的“原罪”由此而生，无数企业悲剧便是在这里层出不穷地上演。转型年代出现的各种问题，自然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注意事项。在那个时代所出现的弊端有一部分得到了根除：司法混乱、权钱交易、地方势力以及黑恶势力的膨胀；有一部分流传至今成为了难以根除的顽疾：畸形的金融市场、不断壮大的垄断资本、公信力不断下降的媒体；从过往的三十年（至今天的四十年）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某一事物兴衰的原因，为我们遇到类似问题提供治理思路。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前文提到了改革开放并不只是决策者一挥而就就能勾勒出宏大蓝图，也是基层的无数群众勇于创新、不懈努力的结果。深圳的奇迹并不只取决于袁庚的宏伟魄力，也取决于数百万移民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开拓勤勉的拓荒牛精神；鼓舞人心的女排奇迹并不只有场上的几名队员创造，也有身后的教练组、后勤组和默默支持的观众创造……三十年来所取得巨大成就，并不只是书中人物努力的结果，也是无数人民所谱写的壮丽篇章。

总结

在开篇“1978，中国，回来了”，作者引用了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我流浪儿般的赤着双脚走来，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再加上那一从拦路的荆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了一道血痕。这段诗用来描述那段时期的迷茫与混乱恰如其分，很多人在那个时代中成为先行者并留下了踪迹，更多的人则是不知不觉地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比如被称作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先生，他离开了中科院，在中关村创立了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在他的影响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渐成规模，但他的公司却不温不火，他前半生所学也没有派上用场，因而他很快被人遗忘，今日他的纪念网站也鲜少有人访问。“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过去的三十年里，先行者总是在充满荆棘与鲜花的道路上演绎了光荣与梦想，也正是这些先行者的曲折探索，才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也使得这个时代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让我们向先行者与改革者致敬。